

陕西抗战记忆丛书

陕西抗战将领

陈答才◎主编 刘俊凤◎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抗战精神 永放光芒

姚文琦

陕西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陕西的爱国军民无论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英勇杀敌，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永载史册，民族精神将世代相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地处西北的三秦儿女和全国人民一样，被日军的疯狂侵略所激怒，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从苏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而且组织了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矢志抗日，誓言宁愿战死，不做亡国奴。强烈要求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收回国土，以雪国耻。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省城西安的学生冲破国民党高压政策的压制，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张学良、杨虎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使陕西政治气象焕然一新，陕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空气最为活跃的地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结束了反共内战，对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总后方，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适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陕西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参加或配合友军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阻止了日军西进步伐。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个是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国民党统治区（陕南、关中及陕北部分地区）。抗战中，陕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在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这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迎来了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驻守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府谷至宜川的千里河防上，阻击日军，保卫了边区；在这里，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他们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既是抗战的大后方，又是抗战的前线。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部分由三秦儿女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第二十二军、第十七军、第九十八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出师华北，英勇杀敌，保家卫国；驻守在绥蒙陕边界、宜川、韩城、合阳、大荔、朝邑、潼关黄河沿岸的陕军各部，形成铜墙铁壁，阻击日军，使日军无法西进，保卫了西北、西南的安全；在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的三秦儿女奋战在大江南北，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陕西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日军对陕西国统区及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使陕西军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但是陕西军民不畏强暴，为保卫陕西，保卫黄河，保卫国家，积极参军参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将永载史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青年参加八路军，民众缴纳爱国公粮100多万石，支前154万多人次，组织150多万头牲畜运送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抗战时期的陕西国统区约有937万人，其中训练壮丁160万人以上。按当时陕西总人口计算，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入伍，占总人口的12%。其中1942年到1945年直接送往中国远征军的兵员为63589人。

抗战中，陕西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成为日军攻击和飞机轰炸的重点。日军空袭陕西的飞机大多是从运城、临汾、太原、武汉、包头等机场起飞。轰炸的范围遍及陕西55个市县镇，西安、延安、宝鸡、潼关、安康等地为重点。从1937年11月7日日军轰炸潼关始，到1945年1月4日日军最后一次轰炸安康，其间日机共轰炸陕西560余次，投弹1.36万枚，炸死百姓9047人，炸伤7015人，

炸毁房屋 43825 间，民众财产直接损失 982.5 亿元。其中一次死伤在百人以上的城市有西安、延安、宝鸡、安康等。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为西安市，日机轰炸 147 次，死亡 2719 人，伤 1228 人，炸毁房屋 7972 间。

日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进行了轰炸，据 1946 年 3 月 10 日延安《解放日报》文章披露，1938 年 11 月 20 日，日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到 1941 年 10 月最后一次轰炸，据统计日机共轰炸 17 次，投弹 1690 枚，炸死 214 人，伤 184 人，炸毁公共房产 1176 间（不含教堂的 169 间和礼拜堂一座），民房 14452 间，毁坏粮食 34.4 万斤，其他间接损失合边币 28.21 亿元，按 1945 年时值约合法币 1.5799 亿元。

抗战时期，主要由陕籍青年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之孙蔚如统领的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高桂滋第十七军，高双成第二十二军以及冯钦哉第二十七路军，武士敏统领的第九十八军，王劲哉率领的一二八师等三秦子弟组成的几支部队，东渡黄河，置身华北、中原等抗日前线，或与八路军配合，或独立作战，奋勇杀敌，抗击了大量的日军、伪军。抗战中，牺牲的陕籍军民达数十万人，涌现出无数动人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乐章。

《陕西抗战记忆》丛书包括《陕西抗战将领》《陕西抗战遗存》《抗战中的陕西民众》和《陕西抗战事件》，太白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再现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抗战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告慰在抗战中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

抗战英烈，永垂不朽！

抗战精神，永放光芒！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立马中条，壮士为国何惧死	/ 1
第一节 “中条山铁柱子”之总司令——孙蔚如	/ 6
第二节 统战典范之传奇将军——赵寿山	/ 18
第三节 炮兵将军——孔从洲	/ 35
第四节 抗日前线逞英豪——高桂滋	/ 52
第二章 血战中原，将军骁勇不言败	/ 77
第一节 不败将军——关麟征	/ 77
第二节 “最好的参谋长”——李达	/ 93
第三节 光头将军——刘玉章	/ 114
第四节 老虎将军——王劲哉	/ 126
第五节 敢死队长——仵德厚	/ 136
第三章 书写传奇，军人沙场显峥嵘	/ 145
第一节 瘸腿将军与“支那第一恐怖军”——张灵甫	/ 145
第二节 统率中国远征军的铁血将军——杜聿明	/ 157
第三节 谋勇将军成就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胡璉	/ 173

第四节	蛮子将军诗文长——高吉人	/ 193
第五节	游击将军英名扬——包森	/ 209
第四章	泣血中华，出师未捷身先死	/ 223
第一节	血战成仁——王竣	/ 223
第二节	何惜微躯——高鹏	/ 229
第三节	忠勇褒天地——张惠民	/ 234
第四节	战壕为棺——雍济时	/ 240
第五节	不捣黄龙，誓不生还——李友于	/ 243
第六节	虎团虎将——陈发鸿	/ 247
后 记		/ 249

第一章 立马中条，壮士为国何惧死

20世纪30年代，横跨北平^①西南永定河上，已有近800年历史的卢沟桥，是著名的燕京八大景点之一。这里涧水如练，西山似黛，每当黎明斜月西沉之时，月色倒映水中，更显明媚皎洁。东北头有四根蟠龙宝柱，中间立着一块大石碑，上刻四个大字“卢沟晓月”，那是清朝乾隆皇帝曾在秋日路过卢沟桥，看到如此良辰美景，赋诗：“半钩留照三秋淡，一练分波平镜明。”并题名立碑于桥头。

不想这一美景之地，竟也是一军事要地。其处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此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外敌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

1937年7月7日夜，一阵阵枪声打破了卢沟晓月的平静。

^① 今北京市。

自19世纪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中国这个古老的邻居，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来到邻家的土地上，试图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早在1931年，驻扎在东北南满铁路的日本关东军挑起“柳条湖事变”，抢得东三省这一大片黑土地之后，更大的贪欲也被鼓动起来。1937年春，大批关东军被从关外调运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这是一支经《辛丑条约》之第九款而派驻平津的日本军队，其时已驻地达30余年之久）在平津近郊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①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声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予以还击。这便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得知和平无望后，中国政府决心全面抗战，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战也迅速形成。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庐山，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

……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20日，抗战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颁发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其中“方略”中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

^① 今北京市丰台区。

战指导基本主旨。”

次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自1937年8月起，日军精锐的机械化军队，遭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以将日本侵略重点吸引到日本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的中国东南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区，利用东南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本装备优势，尽量消灭其有生力量，避免在有利于日本装备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本军队作战，改变日本军队战略进攻方向。为此，中国军队先后沿平汉、津浦铁路沿线，开辟了三个战场，阻击日军南下。其中包括：1937年9月至11月的太原会战，1938年2月至5月的徐州会战和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

同时，日本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国民政府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这些部队装备极差，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了其“三月亡华”之狂语，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淞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由蒋介石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至此沦陷。国民政府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结束后再迁往重庆。同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竟然以持续数周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报复。

1938年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本军队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日本军队在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做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在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

持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不想，世界范围的法西斯战争此时竟形成阴云密布之势。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对中国作战指导方针，做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红军，南面黄河两岸有国民政府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隔邻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长江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晋南是有蒋直系国民党军残存的唯一地区”。

有鉴于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和总长杉山元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1941年1月3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国民政府中央军的一战”。此即“中条山战役”。此役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被俘虏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不过，这一“最大之耻辱”的出现，与之前以三秦子弟兵组成的“中条山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中条山不无关系。时人铭记并痛惜战争之耻辱，却也没有忘记，从1938年至1940年下半年，由孙蔚如带

领的原西北军改编的第四集团军，曾在中条山与日军对峙三年之久，令日军始终无法突破黄河进入潼关。潼关自古就处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要地，在20世纪30年代，兵出潼关，阻击日军的正是陕西抗日名将孙蔚如和他的铁柱子集团军。

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州，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内，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政府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13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为守得家门外的这块“安危之地”，陕西汉子们立马中条，“壮士为国何惧死”，以其特有之质朴和倔强，谱写了“秦军”之大义和悲壮。

第一节 “中条山铁柱子”之总司令——孙蔚如



1938年3月，日军占领晋南，隔岸炮击潼关，威胁陕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弃城而去，搞得人心惶惶。

数日后，西安各界集会，一位表情严肃、步伐沉稳的中年男子走到台前。人们认出这是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将军，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孙将军用平稳却令人感到踏实的语调发表了题为“西北国防与抗战”的讲话，引述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史实，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

并表示自己决不生离西安。会场一时间少了聒噪，多了一份沉重。随后，省政府也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称：“凡我陕西官兵，皆应守土抗战，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孙将军还在救亡大会上向百姓保证，决不让倭寇踏上陕西的一寸土地。他掷地有声地说：“倭寇不灭，孙某家人决不先离陕西，倘有食言，百姓皆可诛之。”陕西自古就是兵家重地，八百里秦川的老百姓，为守住这块家园，也是饱尝战乱之苦，但也因此练就了一副大敌当前仍然咬牙笃定的沉着。如今，孙将军的狠话放出来，大伙心里有了底。

孙蔚如回到家中，知道是卸去这个省政府主席位子的时候了，以便全力以赴带着他的部下，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去。这个当年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秀才”，其实早已经习惯了戎马的军旅生涯。省政府主席的帽子，更像是个文绉绉的束缚。而他的一生，似乎就是专门为

了这场战争在积聚和等待。

就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一年，1896年的1月31日，陕西省长安县^①豁口村的一个耕读世家，一名婴儿呱呱落地。父亲十分喜悦，取名树棠。喻盼此子可令家族开枝散叶，荫泽绵长。时家有薄田数百亩，被村人称为“素封”，即无官爵封邑而与封君一样富有。祖父和父亲务农，叔祖和伯父、叔父均有功名，在乡教学兼务农事。正是在这种农耕兼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生活，树棠自幼随父读书，广涉经史子集，工诗善文，喜好书法又善弈棋。读书之后，取字蔚如，后遂以字行世。正值垂髫，科举制废除，传统的功名不必求，兴实业，也就成为父辈送子读书的新动因，14岁的少年也始入初等实业学校。1913年他考入西北大学预科（后改省立第三中学），而民国肇兴，学而优则“士”（军人），吸引着青年们纷纷进入军事院校。孙蔚如也是在是年进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两年后成为陕西陆军测量军地形课班员，负责实地测绘关中各县地图，跑遍八百里秦川，对关中地形了然于胸。不想这等早期的实际工作，让日后成为军事指挥员的他有了坚实的军事素养。

从20岁开始，孙蔚如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转入陕西靖国军；25岁投杨虎城麾下，追随杨虎城将军。至于和各路军阀打过多少次仗，他自己也无法计算，从排长、营长、团长到师长，也可谓身经百战。1926年，作为第二支队司令的他，曾协助“二虎”师长坚守长安，历时八个月，终赢得长安解围，家园得守。

西安围城战：1926年4月，正当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发动北伐战争之际，北洋军阀吴佩孚指示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八万余人，由豫西进入陕西，企图攻占被陕西国民军控制的西安，剪除西北支持广东的革命力量，为北洋政府扩大地盘。国民军师长李虎臣、杨虎城（孙蔚如时任杨虎城师长辖下第二支队司令）率部不足两万人和全城民众坚防固守、浴血奋战达八个月之久，史称“二虎守长安”。10月，援陕冯玉祥部到

^①今西安市长安区。

达西安，与城内军民里应外合，重创刘军。11月下旬刘军溃逃，西安围解。守城军民和解围部队共死亡五万余人，占当时西安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8年年初，杨虎城赴日考察，临行斟酌再三，决定将军务委托孙蔚如，认为孙“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孙蔚如果然不辱使命，把军队带得有声有色。直至1930年中原大战，孙蔚如追随杨虎城师长加入国民革命军，开始独当一面。中原大战正酣之际，奉令任南阳守备司令，以确保前方补给和后方安全。1931年11月，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进军甘肃，激战而胜，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宣慰使，兼领军民两政。时而守土，时而攻地，竟也是进退自如。唯政务一职，难得长久，旋即卸去，专职军事。以当时之抗日局面看，战场仍是他可以放开手脚的地方，这个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子，反倒令人颇感困顿。

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令孙蔚如想起了老师长——抗战爆发前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同是陕西人，自是对家乡有一份“造福地方”的殷切深意。杨虎城将军是他的老上级，也是前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担任第十七路军下属第三十八军军长的孙蔚如就率部开往陕南，准备配合四川军阀围攻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不过，这么多年来左突右进的军阀乱战，看着跟随自己的兄弟们纷纷殒命，令他心生厌倦，去汉中途经留坝县张良庙时，就曾赋长诗抒怀：“村舍皆丘墟，陇亩失东西……止戈以为武，赤手拯灾黎……英雄事割据，儿子亦古今。”忧国忧民反对内战之情溢于言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以来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冲突的红军，远不像之前的军阀那样混乱散漫。孙蔚如有些踌躇。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少校参谋武志平主动找上了他。

武志平(1901—1991)，北京通县人，时任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少校参谋，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3月，西安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右民、宋绮云向武志平传达中央“特科”的指示：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虎城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并设法开辟川陕苏区

的秘密交通线。

在汉中三十八军司令部，武志平与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次长谈。考虑再三，孙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由南郑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大通江北岸的苦草坝，首先见到了傅钟。武志平撕开薄棉袄的衬里，从里面抽出一条白绸缎，系军长孙蔚如的绢书，上面写着：“现外患日亟，大敌当前，炎黄子孙，以民族生存为重，抗日救国，人同此心，义之所在。我军赞成贵军《一月宣言》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主张，特派武某前来磋商。”为表示诚意，孙蔚如让武志平将一整套四川北部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信器材、医药器械等，交给红四方面军负责人。

《一月宣言》是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宣布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武志平参与了谈判。1933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与孙蔚如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有：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四方面军设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第四，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

1935年2月合作曾一度停顿。到1936年年初，已经晋升陆军中将的孙蔚如所部第三十八军调驻陕北（军部驻三原），孙蔚如一面执行军令，一面仍希望待机参与抗日。遂于8月间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孙作宾到陕北保安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表达“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意愿。毛泽东次月复函赞同双方合作，提议“自即日起，双方都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交通，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老师长杨虎城性情侠烈，对蒋介石频频施压的“剿匪”命令不能忍受，

酝酿联合东北军反蒋抗日。孙蔚如亦心存不满，但深知各方虽在斡旋中，但暗藏危机。1936年秋从宜川驻地密函老师长（杨虎城）：“事须缜密。有谋人之心，事未成而为人知者，害莫甚焉！”

然是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危急之下，也就不说二话了，只有站在老师长身后步步为营。先是出任西安戒严司令，负责西安地区的警备，同时担任“抗日援绥军”军团长、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来到西安，共商大计。周到西安后，孙蔚如代表西北军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何柱国组成了三方联合办公机构，制定抗击南京政府何应钦“讨伐军”的作战计划。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仍兼三十八军军长。当时西北形势极为复杂，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并派“中央军”进驻西安及咸阳以东陇海铁路沿线；冯钦哉率第七军、王劲哉率四十九旅先后脱离十七路军投蒋，老师长杨虎城将军离军出国；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将军因赞成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不为东北军少壮派所理解，惨遭杀害，以后十几万东北军被蒋压迫相继开往豫、皖。

孙蔚如只有在老师长进退维艰之时，奉命稳舵第十七路军，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第十七路军番号被撤销，原第十七路军部队归自己所部之第三十八军建制。经过这一番有惊无险的动荡，第三十八军麾下，仍然聚集了一些三秦将领，包括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王竣、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等。

“卢沟桥事变”后，所部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旅等奉命相继开赴华北抗日战场。五二九旅参加忻口会战，防守正面阵地14天，受到战地指挥官卫立煌五次嘉奖；第十七师奉调参加娘子关战役，担任正面防守，与敌血战九昼夜，受到战役总指挥黄绍竑嘉奖……三秦子弟兵自古在战场上都是好样的。听闻喜讯，孙蔚如还曾喜赋《抗战歌》“此是中原第一战，风云锐利如疾电”，并以“指顾燕儿几点青，定与鸭绿归禹甸”的豪迈诗句鼓励将士奋勇杀敌。抗日捷报频传，孙蔚如露出欣